

# 西方历史学 名著提要

The Summary of the Famous Works  
on Western History

陈启能 主编

HISTORY  
江西人民出版社

# 西方历史学 名著提要

陈启能 主 编

姜 芑 杨 豫 于 沛 副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陈启能主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5

ISBN 7-210-02389-5

I. 西... II. 陈... III. 史学—著作—内容提要—西方国家—前 443 ~ 1996 IV. Z89:K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754 号

## 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

陈启能 主编

姜芃 杨豫 于沛 副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24.5

字数: 615 千 印数: 1-4000 册

ISBN 7-210-02389-5/K·266 定价: 38.00 元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 330002 传真: 8511534 电话: 8514784(发行部)

E-mail: JX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序

陈启能

## —

《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作为西方人文科学名著提要书系中的一本，既有与其他各本共同之处，也有它自身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需要在这里加以说明，因为它们与本书的选材和编纂直接有关。

首先，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历史学是最古老的学科之一。西方的史学源起于古希腊。如果从史学的源头神话和史诗算起，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主要记述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从口头流传到成文记载，大致经历了从公元前12世纪至前8世纪的漫长时光，正式成文则在公元前6世纪。诚然，史诗还不是历史著作，还不能表明史学的诞生，但它对历史学产生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譬如《荷马史诗》就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不仅对后人了解公元前12世纪至前9世纪希腊人的社会状况很有帮助，而且对了解此前的迈锡尼文明（约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200年）也有价值。不仅如此，《荷马史诗》对古希腊的历史观念

也有影响,如其中处于萌芽状态的人本思想。因此,史诗虽然是用文学诗歌形式写成的,但无疑具有相当的史学因素。如果考虑到在当时,史、诗和其他后来才形成的知识学科(如哲学、伦理、音乐、宗教等)都是混合在一起不分家的,就更能理解这点了。

不过,严格说来,史诗还只是史学产生的前奏。更接近于史学的是公元前爱奥尼亚希腊诸城邦出现的纪事家。这些纪事家,虽然开始还受神话传说较多的影响,但他们摒弃韵文改用散文写作已是走向历史编纂的重要一步,而且后来注重记实、怀疑神话的批判精神已经出现。如果米利都人赫卡泰厄斯(Hecataeus,约前550—前478年)在其著作《谱系志》中开宗明义地申言:“只有我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sup>①</sup>因此赫卡泰厄斯也被看成是希腊第一位历史学家。然而,通常被看成西方史学创立者的是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因他的影响最大,被称为“史学之父”。可见,如果从神话史诗算起,西方史学至今约有3000年的历史;如果从希罗多德算起,距今也有2500年了。

由于西方史学历史悠久,就给本书的编纂选材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一是如何从这2500年的漫长历程中挑选出各个时期各个流派或个人方面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代表作,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因为所选的作品,必须要从整体上能反映出西方史学发展的大致面貌、总的趋势以及不同阶段的特点;还要把握不同国家各个流派的特征,反映它们的发展和演变。这是需要动些脑筋的。此外,由于时间跨度大,因而需要入选的、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和著作就较多,在有限的篇幅内加以挑选,难度就更大。就西方近代以前的历史学家及其著作来说,由于经过“时间”这一最权威、最公正的裁判的筛选,哪些作品具有代表性或产生过重要影响,大多已有定论或共识,一般来说比较容易选择。只要力求采取比较科学客

<sup>①</sup> 转引自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观的态度,避免过去曾经有过的极左的全盘否定西方史学的简单做法,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自然这里也有困难,如篇幅的限制使有些作品不得不割舍;有些则因学界对有些史家或有些作品意见不一,如何取舍也值得斟酌。但比起现当代西方史学来,这些困难就显得相形见绌了。现当代的西方史学发展极快,有影响的史家和作品层出不穷。它们中间大多没有经过时间的长期考验,能不能久远地流传下去成为名著现在还不大好说。但如不选这些,甚至少选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不仅不能反映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而且也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因而本书在篇幅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选择较多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是选择那些比较有影响,特别在国内有影响的,或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加以介绍。它们本身或许并不能称为名著,所以选择进来主要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其所代表的一种倾向和趋势。如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就是一例,这是需要说明的。

尽管我们作了思考和努力,但在选材和编纂上肯定还会有不足之处。譬如因篇幅限制等原因,有些作品本应收入却未能如愿。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年鉴派创始人之一布洛克的作品,心理史学以及新史学其他分支的代表作,海登·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作品《元史学》等。以后本书如有机会再版,希望能弥补这一缺憾。

在古代西方史学方面,我们遇到的困难是缺乏有关古代史家生平的史料,后人的考订彼此之间常会有些出入。本书只取其中较多运用的一种,并非定论。此外,在著作标题后标明年份时也遇到困难。一般说来,这里应该标明该著作第一次出版的年代。但古时的著作很难找到出版年代,因而本书对古时著作所标的年代往往是指它写作的年代,而且常常也只能标出大致年份,无法明确标明是哪一年。这也是需要说明的。

## 二

与“历史悠久”这一特点有关的另一特点牵涉到“西方”这个概念。究竟西方指什么？它包含哪些地区和国家？

“西方”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是一个变化中的地域概念。在古代、近代、现当代，西方所指的地域是不一样的。在古希腊时，西方只能包括希腊半岛和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到罗马帝国时地域有了扩大，除了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南欧，还包括西欧、北非和西亚的部分地区。到中世纪，西方就等于整个欧洲，包括东欧，但北非和小亚细亚则已不属于西方概念。近代以来，西方概念又有扩大，把北美和大洋洲都包含了进来。在当代，所谓西方，则把前苏联和东欧排除在外。这表明“西方”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和文化概念，否则就无从解释何以在当代要把前苏联和东欧从“西方”概念中排除出去。同理，在当代谈到“西方”时，还把东亚的日本也纳入进去。如“西方七国会议”就包括日本。因此，在过去东西方对峙和冷战时期，“西方”往往成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不少东欧国家已经或者要求加入欧盟或北约。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概念难免又要起变化。我们自然没有必要专门去研究“西方”这个概念的变化及其含义，但它同本书的内容直接有关。本书要介绍的西方历史学究竟包括哪些地域和国家呢？

本书所指的“西方”主要取当代的概念，但不包括日本，只含西欧和北美。在选材时还尽量兼顾历史上对“西方”概念的理解，即在谈古代西方史学时主要介绍古希腊罗马的史家及其作品；在谈中世纪和近代的西方史学时，由于篇幅的限制没有把俄罗斯的史学收入，这也应算是个缺憾，只好有待以后有机会再弥补了。

第三个特点牵涉到“历史学”的概念。比起“西方”概念来，“历史学”概念要复杂得多。“历史”和“历史学”是不可分的。前者指

自然界和社会中任何一种发展过程,如地球的历史,社会的历史,或个别学科(如物理学、哲学)的历史等。早在古代,已经有了描述自然的“自然史”的术语(*historia naturalis*)。后者主要指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全部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学科,它既指一种知识,又指一种类型的研究活动。历史学和“历史学”概念在西方有个发展过程,在各个时期是有变化的。这点我们在下面会谈到,这里就不多说。在当代,对历史学的理解,或者说对“历史学”概念的解释,依然存在歧义。如有的沿用哲学的分法把历史学也分为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有的把历史学分为两个层次: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为第一层次(历史学Ⅰ),对第一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是第二层次(历史学Ⅱ)。也有的认为历史学包括历史哲学、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史学方法、史料学、历史辅助学科以及史学观念等。至于历史学的性质,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到了现当代,特别由于新史学的兴起,历史学的领域极大地扩大,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和渗透成为趋势,许多新的史学分支相继出现,如心态史、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妇女史学等等。这种状况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作品很难确定就是纯粹的史学作品,或是传统意义上的史学作品。譬如亨廷顿和福山的作品,可以说是政治学著作;福柯的作品《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虽有历史分析,但很难归入传统的史学著作。他分析的医学、疯癫、性、犯罪、人,都不是通常历史研究中的确定的历史事实,而是一种观念或话语。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称他为“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这些复杂的情况我们在选材和编纂本书时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上述这些专门的问题,本书也不可能专门围绕这些问题去选材,因为这样有可能编出的是一本“西方史学理论名著提要”或“西方历史哲学名著提要”,而不是“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了。虽然如此,本书在具体选材时又绝对不能不考虑上述这些复杂情况,必须在选材和编纂中有所反映。



鉴于这样的考虑,本书在选材时,基本上是以对客观历史过程、事件、人物、问题等为对象进行的历史著作为主。这里包括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作品。这样的历史作品,从数量上和从观念上都是历史学的主干部分。人们谈到历史学时主要指的正是这类作品。应该指出,这类历史作品一般虽以叙述为主,但并非没有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在近现代和当代。因此,各篇提要除了简介作者的生平外,还会尽可能对该作品的意义、地位和理论、方法上的特色和创新加以分析。除了上述的主干部分外,本书也收入了那些对历史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著作,如黑格尔、克罗齐、柯林武德、勒高夫等的有关著作。一些不能列入纯粹的历史著作的作品,因对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有影响,同时本身也反映出一定的历史思想,也被收入进来,如亨廷顿、福山的作品。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本书选入的主要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这个问题一度被弄得比较混乱也比较简单化。譬如,前苏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承认苏联的历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把西方的史学统统称为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史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除极少数外,多数被戴上诸如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等帽子。事实上情况绝非如此。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相当大的发展和影响。本书已收入了E.P.汤普森、霍布斯鲍姆、佩里·安德森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因受篇幅限制等原因未能收入更多。

### 三

下面简要地概述西方史学发展的大致历程。西方史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古典史学,即古希腊罗马史学。它起源于神话与史诗,创立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时代。希罗多德、修昔底德

是其最杰出的代表。希罗多德已把叙述历史事件(希波战争的前史和历史)作为著作的主线,并已具有对史实的批判求真精神和一定的历史观(宿命论)。修昔底德对史料的批判原则、摒弃用神的力量来解释历史的人本思想,以及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探讨,都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此外,还出现了一批历史学家,如色诺芬、波利比阿、恺撒、李维、塔西佗、阿庇安等。他们对西方史学的发展都有各自的贡献。如波利比阿的《通史》叙述了被罗马征服的地中海所有重要国家,开创了最早的“世界史”体例。撒鲁斯特、塔西佗、普罗塔克的著作对历史叙述形式的发展很有影响。他们尝试用历史事件参加者的心理来解释事件,运用为人物塑像的方法来描述历史时代。古典史学的传统持续到公元5世纪。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标志着欧洲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西方中世纪史学。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后,基督教的史学和神学史观占据统治地位,古典史学的传统中断了。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9)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55—1274)的宗教信条和神学体系被奉为官方哲学,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总的说来,在这长达近1000年左右的时期内,西方史学的发展是迟缓的。在这近千年内。欧洲没有出现一位可与古典时代著名史家媲美、值得称颂并不被时间长流所湮没的大历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时期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是完全漆黑一片。基督教史学,特别是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确是企图用基督教的神学观念来解释历史,改造古典史学的人本观念。但如果我们拨开和透过宗教色彩的神秘迷雾,却可以从中发现不少对西方史学发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史学观念。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发展”观念和“进步”观念。基督教神学家构造的整个人类历史,从上帝创世到末日审判,是一个单线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其终点是人类永恒的“千年王国”。虽然人类在现世要不

断地赎罪,但其前景却是无比美好的。人类的历史在宗教外衣的包裹下正是朝着这个前景不断向前的一个“进步”的过程。这种历史“发展”和“进步”的观念,不仅比古希腊时的“循环论”、“灾变论”要先进,而且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此外,中世纪史学发展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如“编年史”(chronicle)和“年代纪”(annals)体裁的出现。它们虽然逐渐取代古典时代流行的历史叙述体裁,但仍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有些编年史还突破了狭隘地区性的局限而带有较宽广的横向目光,如艾克哈德的《世界编年史》(11世纪),德意志历史家弗莱辛的奥托的著作《两个王国史》和《弗里德里克大帝传》《法兰西大编年史》(13~15世纪),《西班牙大编年史》(13~15世纪)等。又如,回忆录作为历史作品体裁的发展,历史教科书和文选读本的流行,城市编年史带有较多的世俗特征等,也都值得一提。

第三个阶段从14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直至19世纪末,历时600年。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人文主义史学揭开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新篇章。意大利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创立的人文主义史学反对神学史观,从历史自身来寻找对历史的解释,提出历史的内部法则问题,并认为决定这些法则的是人的本性。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的代表布鲁尼、波吉奥、马基雅维里、奎齐亚迪尼等都已认识到,人和他的活动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后两位甚至看到党派和社会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是历史过程的动力。人文主义史学还把中世纪在欧洲很少流传的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典籍从阿拉伯世界返回西方,重新校勘、辑佚出版。人文主义史学除了对解释历史事件的人本思想和世俗态度外,对史料的批判考订十分重视,由此在不少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开始出现现代学术著作中附录的如索引、参考书目、注释等资料。有的史家(瓦拉)已开始从语文学对史料进行批判考证。有的史家(波吉奥)还注重考古学和对雅典古籍的搜寻。15世纪印刷术的流行对人文主义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西方史学在17世纪的发展中,值得一提的是为政治服务的趋势和不少历史辅助学科(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等)的出现。

18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给西方史学带来了重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西方史学主要是以理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法国的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被称为理性主义史学的奠基者。理性主义史学继承和发扬了人文主义史学的传统,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理性主义史学家从共同人性出发,努力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坚信历史的前进性和光辉的未来。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1774)在西方最早提出系统的历史理论。他的《新科学》(1757年初版)力图用严格的规律性来说明全部人类历史。他建立了历史发展的观点,但他的思想和著作在当时鲜为人知,直至1835年《新科学》被译为法文出版,他才声名远播。法国启蒙思想家从理性主义立场出发看待历史问题,或从人的理性本质,或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来寻找历史规律,或者机械地把自然规律搬到历史中来。历史地看,他们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伏尔泰从承认人类命运的一致性出发,要求对所有民族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并建立人类的全部历史。卢梭建立了人的“自然状态”理论,认为在历史发展伊始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孔多塞提出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观念,强调人类历史过程是从低级社会形式向高级社会形式上升的运动。孟德斯鸠提出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社会发展的学说。德国哲学家康德和他的学生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对西方历史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除法国以外,如英国的威廉·罗伯逊和吉本都是当时有名的历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更成为传世名著。

18世纪末出现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对理性或纯理性的过分强调,无形中成为一种牢笼;非理性的人的情感自然就受到压制。回到人的自然状态,面向过去,呼唤激情,成为一种需要。浪漫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说,

有一点需要指出,即浪漫派在批评启蒙学者的理性主义史学时,指出后者对待中世纪的非历史态度,强调所有历史时代之间是存在内在联系的。他们提出,每一民族的当前状态是长期缓慢的历史发展的产物。由此,浪漫派认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不同民族的质的不同和历史事件独有的特点。正是在浪漫主义史学的影响下,西方史学加强了对中世纪的研究。

19世纪被称为是西方的“历史学的世纪”。这表明在此时,西方史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它的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表明它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世纪最重要的史学思潮是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以及历史主义(主要在德国)。这些史学思潮虽然各有特点,但都具有相对性。在这里,我们不去分别论述,而是准备简要地指出西方史学在19世纪的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在历史观念上,由于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方的迅猛发展,西方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繁荣的状态,在乐观、自信的社会氛围中,多数历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持有以西方为中心的直线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的“发展”、“进步”观念与“理性”、“科学”观念的结合。黑格尔、孔德从哲学的角度对此作了论述。第二,在史学性质上,在近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影响下,许多历史学家不仅力求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中,而且相信历史学也可以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的一门科学。他们认为,只要坚持进行不受主观意识影响的客观研究,就一定会揭示历史真相的客观全貌。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他们认为,只有对史料进行严格、审慎、精确的批判考证,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只有如实地再现过去,才能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对上述这些特点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实证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主要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下半叶,而最能代表它的却是并不列入它的名下的德国的兰克。兰克强调对史实的考证和批判。他的名言“如实直书”和他的著作都为实证主义史学家奉为主

桌。实际上,兰克的史学思想更为复杂,他并不主张只停留在对史实的考证上。但历史却把他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命运捆在一起了。总之,兰克和兰克学派对西方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四

第四个阶段包括整个 20 世纪,可以说是现当代史学。这个阶段又可以二战结束为界分为前后二段。

先说战前这段。进入 20 世纪以后,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俄国革命的震撼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摇了传统史学认为历史是进步向上的直线发展观,也对通过史料考证而认知史实的自信提出疑问。这种对传统史学历史观念的挑战与西方此时历史哲学从思辩的向分析的(或称批判的)转变同步。与思辩的历史哲学注重对历史进程的形而上学的探讨不同,分析的历史哲学主张对历史学的性质、功能、意义进行反思,主张深入理解历史认识本身。由此,对历史知识的研究代替了对历史现象的研究。也就是说,对分析的历史哲学来说,重要的是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而不是对历史过程的探讨和解释。此外,分析派还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否认历史学是科学,至少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学派就提出了这些论点。一战以后分析的历史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对西方传统史学的挑战还来自史学研究本身。这与它本身的缺陷有关。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上层统治者和精英人物以及他们的活动。这样就把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政治史,而把经济、社会、文化等丰富内容以及人民群众的作用抛开了。从方法上,传统史学过分强调文字史料的考证和事实描述,而排斥了理论、概括、解释。传统史学还忽视历史认识问题,把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割裂开。不仅如此,传统史学还忽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

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融和渗透。对传统史学的这种局限性,早在18世纪(如伏尔泰)、19世纪(如布克哈特)就有突破的努力。但真正形成突破的是20世纪初以后新史学的兴起。

针对传统史学的局限,新史学强调扩大史学研究领域,主张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从整体上去把握,特别是提倡以底层大众的生活为重点。新史学反对单纯的史料考证和史实叙述,而主张作深层的结构的研究,重视理论概括和解释。新史学注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广泛结合,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历史学交叉学科,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新史学还重视研究方法的革新和历史认识问题的探讨等等。

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对传统史学构成很大挑战,但总的说来,传统史学在西方史坛仍据主导地位。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新旧交替的时期。在西方,新史学已开始迈出结实的步伐,如德国兰普雷希特对兰克学派的批评,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和特纳的“边疆学派”,法国亨利·贝尔主持的《历史综合杂志》等。最有影响并日后成为西方新史学主要代表的是诞生于1929年的法国年鉴学派。它的两位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创作上都为年鉴派——新史学今后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战后西方史学有了新的发展。大致从50年代中期起,新史学在西方史坛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主潮。这个过程在西方国家不是同步的;作为兰克学派的故乡,德国要晚些。新史学的发展使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流派纷呈、方法多样的新局面。最主要的流派有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或称克莱奥学派以及德国的比勒菲尔德学派。其中,法国年鉴派的影响最大。要注意的是,新史学成为主流以后,传统史学并未消失,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但毕竟大势已去。因此,谈到战后西方史学史学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正是新史学本身

的发展变化。

从 50 年代中期起,特别在 60~70 年代,新史学迅猛发展,可谓凯歌行进。此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适合新史学范型的各种新方法和研究课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六七十年代因而被称为“方法论革命”的年代。其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跨学科方法。其特点是在对社会进行完整的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社会历史科学。在 60 年代,大致说来,对新史学产生较大影响的有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计量方法等。这表明这时期的新史学要构建的是一种分析的跨学科史学。这里反映出一个重要倾向,即这时的新史学虽然对 19 世纪史学的实证性表示不满,对 19 世纪科学主义的一统天下也有怀疑,但自 20 世纪初叶以来新史学家将社会科学方法引进历史研究中的努力,此时并未减弱,反而有所加强。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德国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就是证明。法国年鉴派更为突出,尤其是布罗代尔。布罗代尔不仅是进行跨学科研究和运动社会科学方法的杰出代表,而且也是成功地体现年鉴派“总体史”思想的巨匠。他的巨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及他在时间观上的创新,使他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声名是如此显赫,以致人们长期以来往往把布罗代尔等同于年鉴派或新史学。实际上,这是一种误会。

在新史学取得重大发展的同时,它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受到来自新史学内外的批评与质疑。我们不妨以布罗代尔为例,以窥见新史学弊端之一斑。布罗代尔构建的总体史,结构独特,资料宏丰,但却存在两个无法回避的弊病:一是过分强调超个人的自然—地理结构和物质经济结构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决定作用,忽略了历史中的人;二是过分强调表示上述结构变动的长时段和表示节奏稍慢的历史趋势变化的中时段,忽略了表示历史突发事件的短时段,这就使历史学的特性变得模糊起来。到 1968 年布罗代尔



辞去《年鉴》杂志主编以后,法国的新史学出现了一种力图克服弊端而新见迭出的纷繁多样的局面。此后一段时间,新史学的革新和发展,扩大了史学的认识能力和研究领域,导致了历史学新分支的出现和重组。心态史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历史人类学取得很多成果。此外,历史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历史生态学、民族史、历史社会学等也甚流行。然而,围绕着新史学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新史学可以说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80年代以来,西方新史学的繁杂多样的变化表明它正在酝酿着重大的转折。这些变化中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新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二是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这两者彼此是有联系的。研究方向的转变反映在:有意识地放弃不久前还热衷于对广泛的科学体系和全球性解释公式的构建,具体研究重点已转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限的历史。至90年代,更明确地提出要研究个人(个性)、独特性和突发事件。在理论上提出,首先要注意的不是“长时段结构”,而是要注意历史上的“当事人”(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伟人”)的社会实践。换言之,研究的中心已不是超个人的力量,不是结构本身,而是个人对结构的解释以及不同的个人和每个人所固有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转变反映出对人文知识认识论基础的修正,其表现是急剧地改变了对科学性原则的认识。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中社会科学化的风气已影响大减。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研究方向的转变只是当前西方史学变化的一个方面。实际上,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如对史家与史料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历史认识的对象和方法、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内容、历史知识的叙述形式以及历史文本的解释等等,都有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后现代主义的挑战。